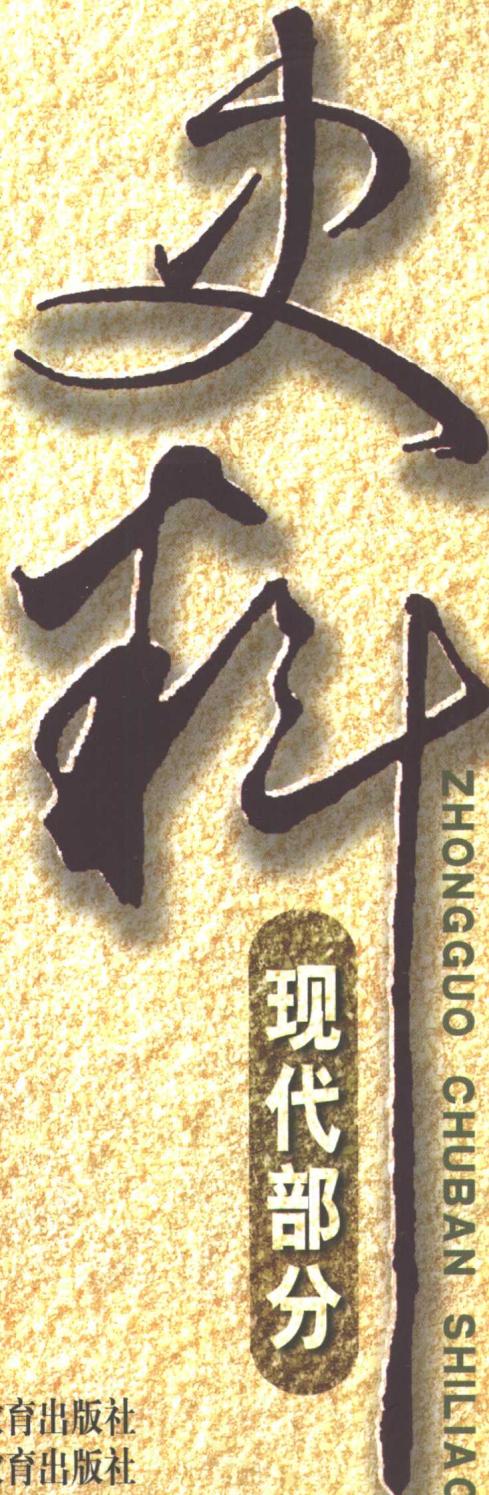


● 吴道弘 辑注

第二卷



山东教育出版社  
湖北教育出版社

● 主编

宋原放

● 副主编

吴道弘

张立升

王建辉

ZHONG GUO CHUBAN SHILIAO



# 中国出版文库

王 编 宋原放

副主编 吴道弘 张立升 王建辉

## 现代部分

### 第二卷

(一九三七年七月——一九四九年九月)

● 吴道弘 辑注

山东教育出版社  
湖北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出版史料 . 第 2 卷, 现代部分 / 宋原放主编 . 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 2000

ISBN 7-5328-3201-5

I . 中… II . 宋… III . 出版工作 - 文化史 - 史料 - 中国 - 现代 IV . G239.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3790 号

## 中国出版史料 (现代部分)

宋原放 主编

### 第二卷

吴道弘 编注

---

出版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(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: 250001)

电话: (0531) 2023919 传真: (0531) 2050104

网址: <http://www.sjs.com.cn>

发行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印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版次: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

规格: 850mm×1168mm 32 开本

印张: 24.625 印张

插页: 5 插页

字数: 400 千字

书号: ISBN 7-5328-3201-5/Z·72

定价: 45.00 元

---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

《解放日报》创刊号(1941年5月16日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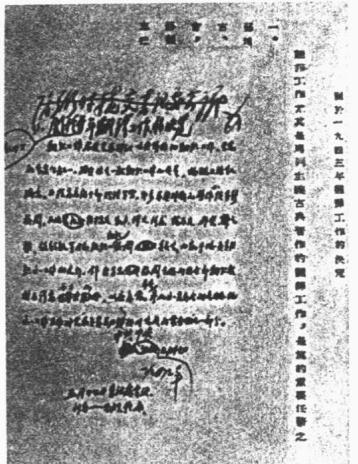
《新华日报》(1945年6月)



《群众》《大众生活》(新一号)、《文萃》创刊号



《解放》(周刊) 创刊号



中共中央关于 1943 年翻译工作的决定



《共产党宣言》(解放社出版)



抗战期间延安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

毛泽东  
为延安  
中央印刷厂劳动模范题词



1942年延安的造纸厂  
(吴印咸摄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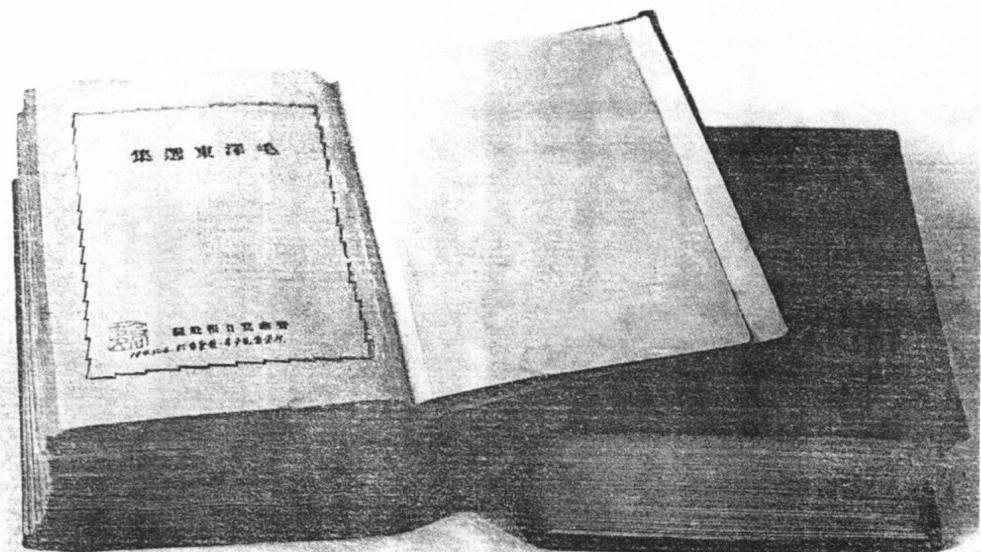
毛泽东 1943 年为延安  
中央印刷厂劳动模范题词



延安中央印刷厂旧址外貌



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



《毛泽东选集》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出版（仓夷烈士遗物）（录自《晋察冀日报史》一书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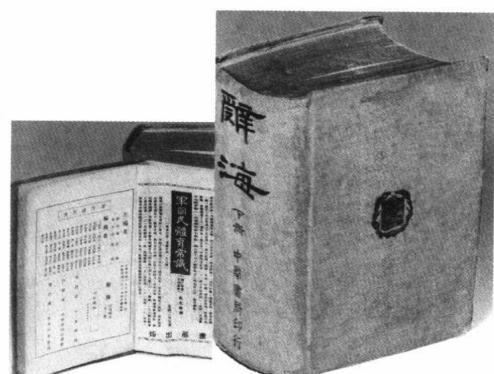
40年代在延安、香港等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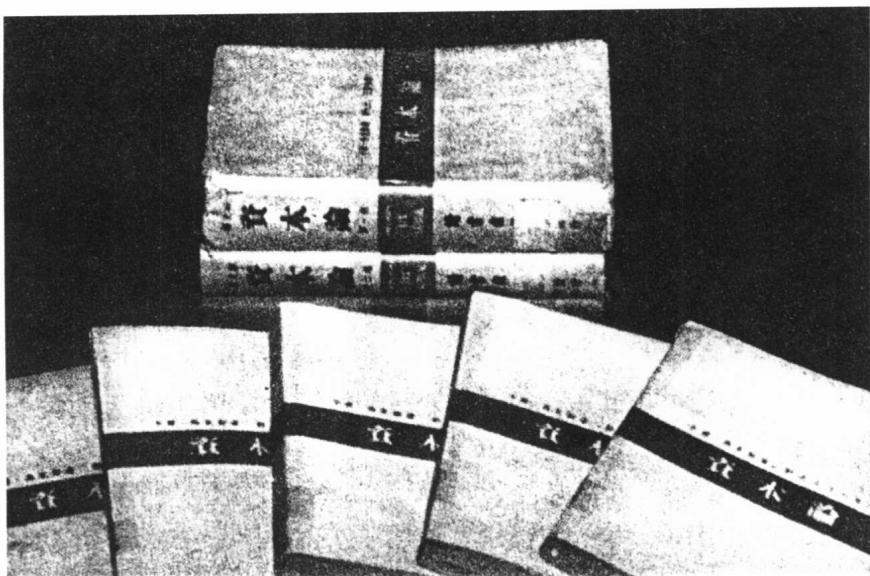
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大学丛书》等著作



开明书店出版的《中国通史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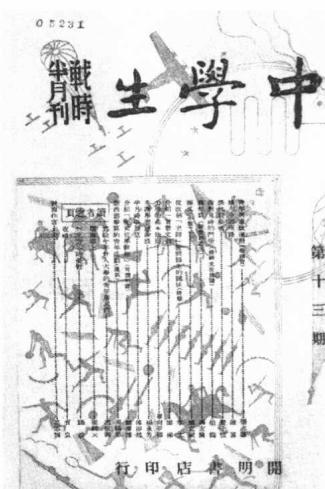
中华书局出版的《辞海》



读书出版社出版的《资本论》(1938年)  
(录自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》一书)



1942年3月桂林文化供应社同人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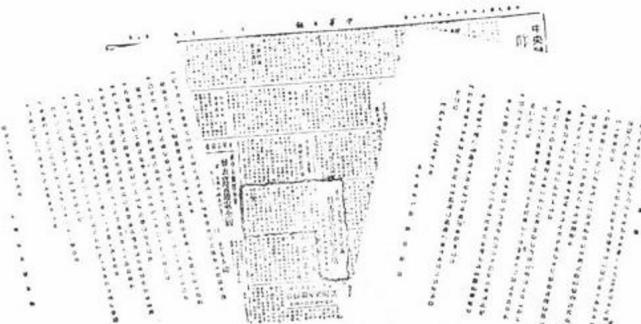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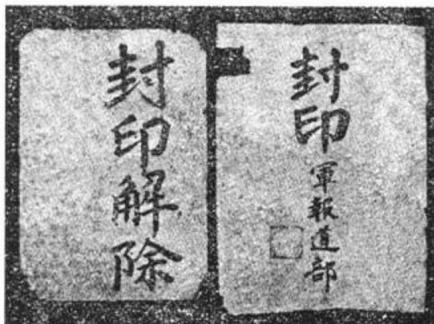
《中学生》战时半月刊  
(封面设计莫志恒)

取締書刊一  
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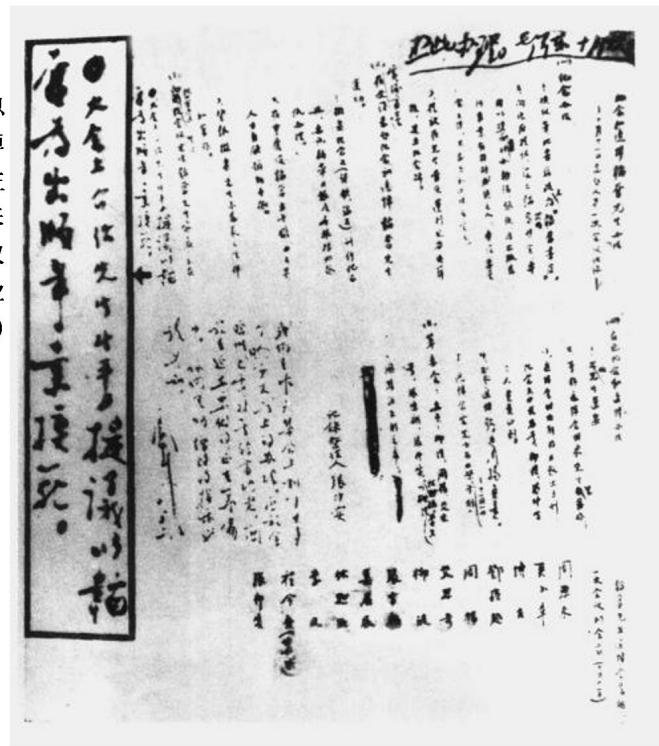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七年十月至三十一年六月

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印  
的禁书目录 (1938年10月 - 1940年6月)

1941年12月26日上海日本军报道部封闭商务、中华、世界、大东等书店时用的贴条(右)、至1942年1月16日启封时的贴条(左)。下图为日本宪兵司令部发给上海书业的通告及汪伪《中华日报》上载有“日方接收有关书店”的文字。(录自张静庐辑注《中国出版史料补编》一书)



1944年延安拟订的《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》(左边方框内为周恩来亲笔所加的“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”手迹的放大)



### 30年代生活书店等的书刊广告

(本卷图片承赵晓恩、曹国辉、方厚枢、喻建章、汪家熔、郑一奇等先生和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提供照片或资料，并从有关书刊摘录，一并致谢。)

## 编 辑 说 明

一、《中国出版史料》（现代部分）所包括的时间，是从 1919 年“五四”运动起到 1999 年 12 月止。

二、本书所收史料，只收与出版工作有关的，以图书、期刊的编辑、出版、印刷、发行、科研等有直接关联的史料为主，尽可能收原始材料，但当原始材料短缺时，则选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署名文章。涉及印刷技术以及一般性的研究论文不收；新闻部分酌收早期影响较大或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报纸史料。

三、《中国出版史料》（现代部分）共分三卷，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：

1. 第一卷（上、下册）——1919 年“五四”运动起至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前（陈江辑注）；

2. 第二卷——1937 年“七七事变”抗日战争开始至 1949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（吴道弘辑注）；

3. 第三卷（上、下册）——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99 年 12 月。其中包括少量新中国建国前夕的出版史料；后有《附录》，收有几篇资料供读者参考（方厚枢辑注）。

四、本书所收史料，大体上按各时期的历史顺序编排，但视具体情况，有一些史料按专题集中编排。

五、本书采用文后注，交代所收史料的出处等情况。凡注文为原文所附者，均在注前加“原注”字样；凡未加“原注”字样

的注释，均为各卷编者所加。

六、本书所收文献中的题名、原文内容均不作改动，以存本来面目；有的传抄早期史料，文中有明显错字、漏字，不直接改正，在文后加上适当的字，用“〔 〕”标明，无法辨认的字，用“□”逐字代替。如只摘文献中有关出版部分，在题后加括弧注明“（摘录）”，或在文后注中说明。

七、本书第一、二卷中收有各个时期少量有史料价值的法规，第三卷反映新中国时期的史料，考虑这一时期的新闻出版法规已另有多种专集出版，本书不再选收。

八、由于资料收录的限制，本书未收录同时期我国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作者所写的出版史料。

九、《中国出版史料》（现代部分）包括的上下限时间历时80年之久，出版史料浩繁，编者仅能从目前有可能收集到的有限史料中选收。编者对所辑史料虽力求做到全面、广泛，内容丰富、翔实，对署名文章注意选收作者亲历其事或史料价值较大者，以便为今人和后人了解近80年来的中国出版史提供一部有长期查考价值的史料集，但限于编者的学识水平和条件，定有重要遗漏或错讹之处，企盼读者给以批评指正。

十、本书在编辑过程中，得到出版界多位老领导、老同志的关注、指导和大力协助；山东教育出版社领导同志及社内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，使本书能在较短时间内出版，谨在此表示衷心的、诚挚的感谢。

编 者

2000年9月20日

## 序 一

胡道静

我国是一个出版事业飞皇发达的大国，又是印刷术最早发明的大国，是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国家，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创源地。但有一点是奇怪的，就是记载这些创造和记述出版事业蓬勃踊跃情况的材料并不活跃，显得很不相称。我国在唐代初年即已发明雕版印刷术，可是没有文字记载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韩国汉城佛国寺发现塔顶所藏经卷，其中用有唐武则天所制造的文字，证明其为当时的印制物。后来雕版印刷在民间普为流传，刻印佛经、日历等，多有实物发现。再后到五代时，政府刻印《九经》，广颁民间。可是直至宋初编著《五代会要》才略有记载。唯一突出的记载，是活字版发明后，还不到四十年，便有沈括详细记述在他的科学著作《梦溪笔谈》中。正因为沈括是一位科学家，才能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历史事件，而能作出及时的、详尽的记录。

更令人惊异的是，我国近、现代的社会变革，经济发展，文化活跃，无一不是由于广泛流传的新兴出版物所引起与促成，而在出版界本身方面，却淡然置之，鲜有对此开天辟地的伟业加以记录。虽也偶然有些论文，分散发表，终未见有体系地、面面俱到地加以叙记。有鉴于必须弥补这个缺憾，我们出版界的宋原放、吴道弘、方厚枢、陈江、汪家熔、王有朋等同志，接受中国

出版工作者协会老出版工作者委员会的委托，负担起编纂巨型《中国出版史料》的重任。我在序首不嫌其烦地描述了我国出版界的缺陷，意在反映出如今这一巨大著述文集出现的重要意义与价值，是值得令人兴奋的大事。

新编《中国出版史料》共为十册，约四百万字。其上限自古代至近代，下限包括共和国成立后至世纪末。半个多世纪以来文献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多多，当然包括在内。本书在着手编纂之前，经过郑重周密的考虑，所以框架结构完善，收录有条有理，故名为《史料》，实际成为一部可阅读的信史。正因为这样，显出与已往张静庐先生所编《中国近代出版史料》和《中国现代出版史料》有很大的不同来。从名称上看，张书即有时代上的局限性。其次，张书数编，次第编印，不适合于阅读求得全面认识的要求。新编《中国出版史料》并非为顶着张书的不足而来，但我觉得应有说明几句的必要。

还有，近时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《中国当代出版史料》一书，主要是收集《出版工作》、《中国出版》、《中国出版年鉴》以及各类报纸上有关的论文，分列专题而成。它的编辑特点和本书不尽相同，各有各的用处。我觉得也有在这里说明一下的需要。

中国出版事业将有更大的发展，对人类文明将起更大的作用。鉴往知来，在此分界线上，有宋原放等老同志这一部“光彩著作”的照耀，光辉的前途就在我们的眼前。

二〇〇〇年七月一日胡道静序于上海海隅文库。

## 序二

王益

我国出版界，对出版史料的收集、整理，对出版史进行研究，逐渐重视起来了。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。宋原放等同志主编的《中国出版史料》，皇皇十大册，包孕古今，是一部从古代到当代的大型出版史研究文集。它的出版，是我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。对于为此操劳的各位同志，包括接受出版的出版社的同志们，我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。

出版史料是为出版史研究服务的，而出版史研究又是为出版工作服务的。

出版史料的收集、整理，为出版史研究创造条件，提供依据。出版史研究，必须以出版史料为依据，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根之木。但出版史料的收集、整理，不能代替出版史研究。

一般讲：“鉴往察来”，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，出版史料可以直接为出版工作服务。但出版史料真正要为出版工作服务，更好地为出版工作服务，必须经过咀嚼消化。出版史料好比是富有营养成分的食品，食品必须经过咀嚼消化，才能被人体吸收。史料的咀嚼消化就是研究。通过史料的研究，总结出规律或规律性的东西，才能对出版工作起指导作用。

出版史料的收集、整理与出版史研究，可以看作是两回事。

是互相衔接的两回事，因此也可以看作密不可分的一回事，或一回事的上下工序。不可以没有出版史料的收集、整理，也不可以没有出版史研究。

出版史料的收集、整理，可以吸收广泛的同志参加。凡做过出版工作的同志，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提供一些出版史料，而出版史研究，却会给人以高不可攀的印象，因而参加的人较少。其实，出版史料的收集、整理，是出版史研究的组成部分。参加了出版史料的收集、整理，就是做了出版史研究的基础工作。

重要的一点是勿忘目的。不论做什么事，都要有目的，按着目的去做。有目的才有方向，无目的就没有方向。出版史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出版史研究都应该围绕一个目的去做。这个目的，就是繁荣和提高当前的出版工作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。我相信《中国出版史料》一书的出版，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2000年7月26日